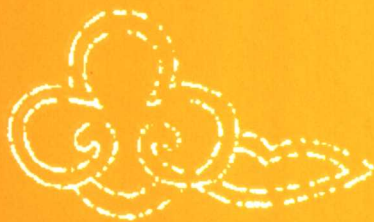


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蒙古文化 专题研究

MENGGU
WENHUA
ZHUANTI
YANJIU



● 嘎尔迪 著

民族出版社



蒙古文化 专题研究

MENGGU
WENHUA
ZHUANTI
YANJI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嘎尔迪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蒙古文化专题研究/嘎尔迪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6

ISBN 7-105-05837-4

I. 蒙… II. 嘎… III. 蒙古族-民族文化-专题研究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212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金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15.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目 录

第一章 蒙古高原上早期人类文化与蒙古文化	(1)
第一节 石器时代的蒙古草原文化	(1)
第二节 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早期时代的草原居民文化 ..	(12)
第三节 匈奴与蒙古的文化关系	(20)
第四节 东胡系诸民族与蒙古族的文化关系	(37)
第五节 鲜卑与蒙古的文化关系	(45)
第六节 契丹文化与蒙古文化的关系	(49)
第七节 蒙兀室韦在蒙古民族起源中的作用	(63)
本章小结	(83)
 第二章 早期蒙古文化的几大特点	(88)
第一节 早期蒙古人的经济文化	(89)
第二节 蒙古族语言文字文化	(94)
第三节 蒙古族婚葬文化	(95)
第四节 早期蒙古人的城市文化	(101)
第五节 早期蒙古族的宗教信仰	(104)
 第三章 蒙汉文化交流	(108)
第一节 儒、释、道文化与蒙古民族文化	(108)
第二节 蒙汉农业文化交流及其意义	(114)
第三节 蒙汉文学文化的交流	(133)

第四节	蒙汉翻译在蒙汉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165)
第五节	蒙汉节日的文化交流·····	(167)
第六节	蒙汉建筑文化交流·····	(171)
第七节	蒙古族“胡尔齐”对蒙汉文化交流的贡献·····	(174)
第四章	蒙古族与藏族的文化关系·····	(176)
第一节	蒙古帝国和元朝时期蒙藏文化关系的 确立及重大意义·····	(176)
第二节	明代蒙古族与藏族的宗教文化关系·····	(187)
第三节	清代蒙古族与藏族的宗教文化关系·····	(192)
第四节	蒙藏文学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201)
第五节	书面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216)
第六节	蒙藏语言文化的交流·····	(222)
第七节	藏汉建筑学文化促进了蒙古族建筑 艺术的发展·····	(226)
第八节	藏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全面渗透·····	(229)

第一章 蒙古高原上早期 人类文化与蒙古文化

第一节 石器时代的蒙古草原文化

蒙古族是在蒙古高原上曾经居住和辉煌过的诸多古老民族之一。在历史上蒙古诸部在蒙古高原上的形成，经历了一番复杂而长期的自身发展、互相融合不断演变的过程。蒙古语族语言区域的形成，其开始阶段是与一般人类发展有诸多共性。研究家们以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最新成就为依据推测，人类的形成过程长达数百万年。第一批人类的出现约在 300 万—150 万年之前。^① 人们认为在蒙古高原上发现的人类特有活动，劳动工具及其制造的最早遗迹属于较晚时期——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结束阶段约 70 万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考古学家经多年的努力在内蒙古地区各地发觉了大量古人类活动场所，如：大窑文化，位于呼和浩特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② 前苏联和蒙古国考古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在蒙古各个地

① 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25 页，中华书局，1984。

②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69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区搜集到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劳动工具，在毗邻地区也发现了许多石制工具。

有些学者对欧亚大陆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研究，提出古人类早期在蒙古高原上最早形成的观点。他们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结束阶段，有若干盲目寻找猎物的流浪采集者和狩猎民群迁居到蒙古高原。这些人类来自原始人类已经开发的两个区域。其一来自亚洲东部和东南部。他们的到来为蒙古高原上带来了加工石器的技术和用从卵石一侧敲击下来的粗糙石块制造主要工具的传统技术。石器如石斧、砍削器等，在蒙古各地多有发现。其二来自西方，他们带来了另一类型劳动工具及其加工技术，经过简单敲制加工成的双面手斧，其外形与阿舍尔时期的相似。各种传统技术直到下一时期仍在蒙古境内发展着，但是卵石工具却是最主要的类型。^①

由此他们认为中亚是两种传统的代表者汇合的地区。这一点可由蒙古国境内发现两种类型的工具看出来。其中之一与阿尔泰和中亚工具相似，另一种与黑龙江样式相似。^② 这里所指的西方是今蒙古高原的西部地区及中亚地区的更大范围。都属于早期黄种人的活动范围。

从考古学家们刊布的材料中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中亚居民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即已掌握了几种石器，可以用来进行打击、刮削、切割之类的劳动项目。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加工较软的材料，如：木头，兽皮，骨头。这一时期中亚居民的文化状况主要可以由“石器工业”判断出来。“石器工业”的特征是一套简

① [苏] 奥克拉德尼科夫：《农耕业在贝加尔湖以东和蒙古的出现》，《古代世界》，1962。

② [苏] 奥克拉德尼科夫：《蒙古的旧石器时代》，《苏联代表团在第九届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大会上的报告集》，莫斯科，1973。

单活动，如：敲击，切割，刮削，且加工粗糙的劳动工具。C·A·谢苗诺夫曾对古代人类的体型与其使用的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尽管蒙古境内旧石器早期人类骨骼尚未发现，但其一般面貌仍可根据劳动工具判断出来。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劳动工具庞大而沉重。由此可以推测，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一定体力非凡，体格发达，但运动和感觉反应却不够发达。人类学家对欧亚大陆各地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人体骨骼若干碎片进行研究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在15万—10万年前，从中亚的捷希克—塔什到现在我国的河北省和山西省的广阔范围内居住着一些人类。他们的种族特征尚未形成，只出现了一些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趋向，即今天蒙古人种所具有的铲状门齿。这些远古人用火、居洞穴、以狩猎为生，其中包括猎鹿。猎鹿是在季节性迁徙过程中在河边渡口进行的。由此可见，20万—10万年前居住在蒙古高原的狩猎民和采集民也会用火，也十分熟悉动物的习性及其行动时间和路线。因此，在今天蒙古地区早已经消失的河流岸边或当初曾是食草动物渡口和季节性草场的宽阔河谷地多次发现石斧和其他工具，就不是偶然的了。^①

获取大量食用动物的基本方式是全体参加的围猎。捕获的动物大家一起吃掉。古代狩猎民集体是由不断迁徙和聚集在公共火堆旁的几代人组成的，他们尚未形成禁止氏族内婚的氏族群。不过，这些群体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有一定的特征，凭体力大小挑选领袖人物，在群落中有一定的宗法性，有一整套语音信号。可以这样推测，蒙古旧石器时代居民已经积极显示出了，一群人的想法和感觉与这群人中的每个人的想法和感觉是不一样的。由此又可区分出一组现象（集体观念），这些现象作为强制性的外部

^① 详见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所著：《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一），上册，9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规范，将个人行为组织到“群”中。

当时的人类集体面临着一系列日常任务：组织狩猎，分配猎获物，抵御猛兽和其他流浪狩猎人群的袭扰，开发周围的自然环境，将积累起来的比单个人经验更丰富的集体经验传给下一代。要解决所有这些任务，不仅必须建立行为规范，而且必须完善周围世界的概念，并借助人群中为全体成员所明了的手势信号，将它传下去。这一时期是采取两种途径将知识传给下一代的：一是教儿童制造劳动工具，打猎，加工兽皮，做饭，建造防寒住所。看来，孩子们是在玩耍中、在模仿成年人的行为过程中学会所有这些的。另一方面：调整人群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思考所在环境的事物和现象，则是借助有声语言实现的。看来，早在 20 万年以前，有声语言中就已拥有足够量的表示周围世界所有财富的信号了。日和月，天地和星辰，光明和黑暗，流动的河水和平静的湖水，覆盖着树木花草的高山，鹿、象、鸵鸟、马、驼和其他动物，鲜花和飞鸟——所有这些五光十色的自然界都会在人们的意识中反映出来，构成概念，并获得名称。这一古老语言就是今天人们所谓的“阿尔泰共同语”的基础。世界和人一样，也是运动着的，因此动物名称常常以其运动的类型来命名。阿尔泰语系中许多名词来源于动词，有的甚至还是按着运动形式的类型构成的，比如，通古斯-满洲语中“鸟”是“会飞的”意思。一些与人本身相关的概念，与人在集体中的性别、年龄次序相关的概念，与共同劳动行为如集体狩猎相关的概念，也属于古老的词汇类型。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形成的概念中，还有一些与属于人类集体日常活动范围的人，周围环境、行为和事物有关的概念。语言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交际和调节集体活动。

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是狩猎和采集可食的动物和植物。蒙古地区境内十分常见的临时性遗址，供寒冷季节居住的洞穴和山下可遮掩的地方。狩猎民和采集者的生活方式使中亚的

居民不得不处于游动状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群之间的交往，于是在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信号单位，在互相交往的相邻人群之间出现了相互沟通必不可少的起码的相似的信号系统以及共同的语音规律，亦即产生了被语言学家称为“阿尔泰共同体”的远古语族具有的“原始语言连续性”的语音形式。

因为动物季节性迁徙路线一般是春夏向北，秋冬向南，故长途跋涉寻求猎物并在颇大范围内猎获食物的人类集体也应当随之运动。所以，有着相似运动路线的毗邻人群间首先产生群际交往是很自然的了。这种情况就为加强经常性的联系创造了条件。而经常性联系的加强又要求互相交往的人群至少在最低量的共同概念及其手势表象范围内创造出共同的信号体系。这类体系在旧石器早期显然是由一套小小的没有完全区分清楚的元音音组和辅音音组组成的。不过它们的频率用人耳是可以接收的具有元音和辅音——它们起着区别语义的作用——相结合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交替的特征。现已确定，在世界各民族的语言中，这类语音的数量约在 14 个到 81 个之间，大部分是在 25 个到 30 个之间。这是人类语言共有的特点，也是人类与其他生物（鸟类、动物）的信号系统在族属上相区别的地方。这种语音特征显然也为旧石器时代早期末居住在中亚的第一批人类集体所具有。从最初的语音成分中——在阿尔泰语系中，这类成分就其数量和象征信号，在与其他人群的交际过程中发展，增多并丰富起来。语言学家认为，阿尔泰语系中最古老的词汇层是单音节词，构成这些词的辅音多半是塞擦音 b, M, T, N 等。比如，“火”在蒙古语中叫 [gal] “嘎勒”，在古突厥语中叫 [bag] ~ [Mag] “崩” ~ “猛”，在通古斯语叫 [ba] “比”，“这个”在蒙古语中叫 [ene] “额耐”，在古突厥语中叫 [bu] “布”，在通古斯语中叫 [ter] ~ [er] “塔尔” “额尔”，“那个”在蒙古语中叫 [tere] “特乐”，在古突厥语中叫

[ol] “奥勒”，在通古斯语中叫 [ter] “塔尔”，“集体围猎”在蒙古语中作 [ab] ~ [a6] “阿喔”、“阿勃”，在古突厥语作 [ab] “阿喔”，在通古斯语中叫做 [agala] “额格勒格”。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单音节词也是逐渐完善为有声语言的中亚远古居民语言所具有的特征。季节性迁徙的方向及其地域上的局限性限制了人们的群际交往，却加强了在由北而南这段地域中形成的交际。当然，这种交际在比较亲密，常常相逢，能够交换物质文化用品和其他文化成就，比如加工材料的新方法或者所得到的石器品种，加工工具的方式的人之间非常频繁。据 A·N·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考察，在今天的蒙古国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多数遗存位于石器加工场及与之相邻的遗址上。遗址在卵石滩和宜于制造劳动工具的石块裸露处：蒙古国布尔根苏木，博克多苏木以及戈壁阿尔泰省的敖特根—曼特的遗址和加工场。^① 这可使我们设想，出现在蒙古高原上并在那里居住的人类不仅在寻找野生动植物，而且在开发自然资源——可以加工的石块。比如，在蒙古国境内莫依勒腾—阿姆的多层次居址中，就可看到他们世代使用的这种资源。居住在石块露头处的狩猎民和采集者群拥有很大的优越性——他们有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最好条件。近处没有石块产地的人群，其处境不好。于是，这两类人群之间很可能会进行交换，也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各种原始狩猎民群在一定的季节来到石块露头处加工工具，积蓄起来以供长期使用。这一时期很可能是群际交往的良好时机，它可为产生互相理解的语言创造条件。

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蒙古高原及其毗邻地区出现了与冰川期有关的严寒时期。为了适应这种已经变化了的条件，蒙古高原居民

① 奥克拉德尼科夫：《原始蒙古·论蒙古史上古史问题》，《历史学研究》丛刊第3卷，乌兰巴托，1964。

占据山洞、山中遮掩地和洞穴作为经常性住所，不仅学会用火，而且学会取火。它们把火精心保存下来，用来制作熟食品。劳动工具也在旧石器时代完善起来，通过所谓“尝试与错误”的方式造出新式石器，如片石器、石核器、用作刀子和投枪尖的尖石块、加工兽皮的刮削器等。^①

这一时期，人们用专用针刺穿兽皮四边，以筋或细皮条缝合起来，制成衣服。古代蒙古高原地区最早的衣服样式当是用兽皮做成的腿带、束腰和披肩。鞋是软皮鞋，用皮带束在脚上。当时的革制品和衣服都未能够保存下来。不过加工皮革用的工具，固定皮革制成的零件时用的针锥，多数却在蒙古旧石器时代中期及其后期的遗存中出土，可以说明缝制衣服已经成为常事。兽皮还用做垫子，被子和雨衣。

由于气候改变，造成了部分居民游动区域受到限制。猎取猛犸、长毛犀和大角鹿以及当时生存在蒙古高原上的其他野兽，需要居民中体格强壮，久经锻炼，严格训练，武装起来且便于行动的人们共同行动。无法在雪原上追逐野兽的儿童、老者不符合这一要求。因此，他们与哺乳期中的母亲一起留在洞穴中，等候猎人归来，加工带回的猎获物，帮助猎人制造劳动工具和武器。保卫住所、保存火种、教育正在成长中的后代也是他们的职责。

由于气候变冷而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部分居民的大量时间要在空间较小的山洞、洞穴或火堆旁的其他住所度过。这就是外出狩猎者与留在住所者所得印象和日常经验不相同的原因。这种情况的出现又会使人们产生交换印象和经验的愿望。为交际而交际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形式之一，它对语言的发展是一种强有力的推动。

由于活动受到限制，人类省去从前用于迁徙的时间，于是蒙

^① 详见《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一），上册，89—91页。

古诸部的老祖先就有时间进行脑力活动了。当初，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是含混不清的，对周围世界的解释还是幼稚和充满幻想的。灶火的暖意及灶在住所中的中心位置，“舒适”和生活本身对火的依赖，这些都构成了人们把神圣的火看成是一种蓬勃力量的初期观念的基础。这类观念此后在蒙古萨满教中还一直保留着。看来，灶火和太阳的光和热之间的联系也为人们所注意，成了上帝天和火神的思想基础。由此又产生了阿尔泰语系民族中广泛流传的与火有关的禁忌，比如：禁止把自家族火种引给外人。

集体生活的质量直接影响猎获野物的多少，食用猎获物与集体的平安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人们产生了人与动物之间有血缘关系的想法：人喝掉野兽的血，野兽的灵魂也随之进入人的血液。这一思想后来发展为关于野兽祖先的图腾传说。妇女留在住所的灶火旁准备饭食，哺育孩子。她们的社会作用成为将妇女看做是老祖母和在集体中以其永恒的炽热发挥其特殊力量的家灶的守护者这一思想的来源。此后，这种思想又导致女萨满巫士的出现。这种习俗在蒙古人中一直残存到公元 20 世纪初。这样，寒冷时期和人们被迫住进经常性住所时期的到来，就从心理上和社会上为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蒙古高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是由冰川期转向现代地质代的过渡时期。气候转暖为原已大多死亡的猛犸、长毛犀、大角鹿、羚羊、野牛等更北地区动物一起发现的南方动物品种（盘羊、鸵鸟）向蒙古高原迁徙提供了可能。动物的增加和气候的好转也为人类的进一步发展和人类活动的完善创造了良好条件。投枪式专门武器的出现为远距离命中提供了方便，而捕猎的运用又提高了狩猎业的生产率。

随着猎获物的增多，狩猎地域更加缩小，更多的居民也开始定居下来，在蒙古境内及毗邻地区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遗址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居民人数明显地增加了。一种新的

社会组织形式即母系氏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其残余至今犹可在蒙古语中发现。

在蒙古高原上居住的古人类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懂得绘制与宗教礼仪有关的洞穴壁画。在蒙古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岩画以及在蒙古国科布多省蛮很苏木以西 25 公里处发现的洞穴壁画即可说明这一点。那里有用赭石、白垩、煤黑及其混合物画成的当时人类周围生存着的种种动物（牛、山羊、野羊、象或猛犸、鸵鸟、骆驼）以及现在已不复存在的针叶树。鸵鸟和骆驼是蒙古地区岩画特有的题材，这种情况在欧洲岩画中是没有的。^① 这类岩画的特点是画在平面上的二维轮廓图形。这种画法成了蒙古造型艺术的传统，并一直保持到公元 19、20 世纪。

蒙古地区考古发现表明，到中石器时代，居民们已经学会用石头或骨头结合的方法制造工具了。这类工具以骨头为主体，在骨头上开槽，槽里嵌入薄燧石片。如此看来，中石器时代的蒙古诸部祖先不仅善于制造他们所需要的标准形式的工具，而且具有善于艺术组合的才能。他们加工燧石、玉石、玉髓的艺术是如此完善，以致他们制作工具就其精巧程度来看简直可以同用宝石制作的装饰品相媲美。在这一时期，当地居民考察了各类宝石（玉髓、燧石、玉石）的产地，并对它们的性质作过研究。

中石器时代发明了简易弓箭。这一发明使单人猎成为旧石器时代即已有之的传统项目（围猎，赶猎，用网套捕猎）之一。射猎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猎物，因为猎人可以偷偷地从远处杀伤动物，而且可以使与心理过程有关的习惯技能如：敏捷性，在实践中计算射程的能力，敏锐性，协调动作的能力得到发展；亦即是说，使人类个人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些可以比较出人类

① [蒙] 道尔吉：《蒙古人民共和国岩画的分期问题》，《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著作集》，乌兰巴托，1973。

个人品质的传统竞赛项目如射箭等等，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类竞赛活动大约当在传统的祭祀祖先的日子里于充当中石器时代居民祖先住所的洞穴和山洞旁举行，那里凿刻着过去留下的动物岩画，其中有一部分动物到中石器时代已经被灭绝了。

在蒙古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由于有这一时代大量的各式各样的遗存出土，而得到了比较详细和比较全面的研究。这里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居址和墓葬。这一时期的居民继续使用石器、骨器、角器和木器，在使用过程中使之逐步复杂化和完善化，而后又采用如陶器之类的新材料，开始制造陶器。陶器碎片是公元前三千年及其后时期蒙古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最常见的出土物。其中还有发现了石器和骨器（骨器中有鱼叉），以及复杂式弯弓，这种弯弓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沿用下去。还有箭上用的刮磨平整的骨片。陶器为薄壁型，带有细砂杂质，图案为绳纹和细短横纹。^① 考古发掘今蒙古国境内塔木察格布拉克居址中一住所，其平面图成长方形（总面积为42.5平方米）。就类型而言，它与黑龙江中游以及远东新石器时代的住所相近。^② 长方形住所遗址的发现说明，当地最早的定居式住所——层状屋已经出现。这类住所是半土穴式，四周壁由草土层充当，屋顶可能也是草土层（或是桦树皮，大型兽皮和其他合适的材料），屋内用支柱（“巴干”）来支撑。

在蒙古高原上既有临时性住所又有经常性的土穴住所，这一情况说明，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向农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定居过渡。大量出土石臼、石杵，挖掘器上的加重物以及稍晚一些时候的锄头的出土，证明新石器时代居民们的农业有了发展。居民们已经从野生禾木植物（各类谷物，大麦，麦

① [蒙古] 道尔吉：《东部蒙古的新石器时代》，新西伯利亚城，1969。

② [蒙古] 道尔吉：《东部蒙古的新石器时代》，新西伯利亚城，1969。

子)的积极采集过渡到了早期形式的综合生产经营——最初为锄耕农业与狩猎业、畜牧业相结合,其后是犁耕农业与狩猎业、畜牧业相结合。经济类型取决于自然条件。河湖沿岸的居民还从事捕鱼业。但是这种经济形式不像同一时期黑龙江或贝加尔湖滨那样,没有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新石器时代发展起来的农业和禾本科作物(谷类)收获业决定了这一地区此后所有民族的农业类型。这种类型的农业与黄河中游富饶河谷新石器时代居民发展起来的那种农业,区别越来越大。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野生动物的驯养过程也在进行之中,驯化的动物以马最多,其次是牛。同时,骨骼遗物可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即猎获黄羊和其他野生动物在居民们的经济活动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新石器时代,居住在黄土地区的居民与居住在北部地区种植旱带禾物的居民之间,在经济上互相区别开来了。汉语和阿尔泰语系中表示新石器时代已经发展起来的禾本科作物的术语不同,蒙古语中农具的叫法与汉语不同,这说明,蒙古人种人在亚洲中东部,在语言上两种语系已定型。

东部蒙古新石器时代居民就其人类学类型而言,当属于大陆蒙古人种(脸扁平,额头高而宽阔,鼻梁骨不突出,门牙成铲状),也就是说,从谱系上看他们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居民是一脉相承的古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甚有特点。蒙古国东部区发现撒有赭石的竖井式墓葬。塔木察格布拉克居址的一个住所的北墙根下发现一座墓葬。墓穴成细竖井式,尸体成屈坐式,尸骨旁发现有碎珠,墓中有大角鹿齿做成的装饰物,可藏式骨刀和管状骨做成的针盒。

新石器时代为中亚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在旧有文化的基础上,区域性文化开始形成。考古学材料毋庸置疑地证明,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显明的区域性文化。然而这些文化又由连续性传统与先前的

文化联系在一起，在一些场合下，表现为多层次居址。其主要特点一是居民在进一步分化，产生劳动逐步固定化的特点；二是习俗特点，语言特点的文化中心在形成，集体经验和文化成就以及社会信息在区域性人群中的代代相传，促进了该区域人群的一体化并使之独立于其他人群。这样，最终就会导致区域性文化范围内的语言走向一体化。这一时期就是阿尔泰共同语走上了产生不同语族的时期。

第二节 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早期 时代的草原居民文化

在公元前 2000 年时，蒙古高原境内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石器时代比较温和湿润的气候逐渐为干燥和强烈的大陆性气候所代替。从而带来了河床干枯，野生动物逐渐减少，沙丘化过程在戈壁地区逐渐出现，形成了中世纪和现代蒙古特有的气候，辽阔的草原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夹杂着冰雹的倾盆大雨，冬天是风雪严寒，夏天是一片酷热。大部分地区气候的改变，使古代农业生产丧失了继续发展的良好条件，农业在戈壁地区逐渐消失。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周围环境条件，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经济——游牧业。这一过渡时期很长，发生在蒙古民族祖先处于青铜器的时代。到公元前 1000 年时，才完成过渡到游牧经济文化类型。这种经济文化类型在此后一直稳固地保持到今天。

在蒙古高原干旱地区，游牧业是惟一有效的经济形式，因为它同农业相比，使用男劳力较少，而实际收益甚大，如可得到丰富的肉食品和奶食品，以及燃料牛羊粪，制蒙古包用的毛毡，做